

宝庆讲寺丛书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

朗宇法师

清修法师

主编

中国中古佛教史论

颜尚文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宝庆讲寺丛书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

主编 朗宇法师 清修法师

副主编 圣凯 道坚 黄夏年



中国中古佛教史论

颜尚文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中古佛教史论/颜尚文著.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80254-345-4

I. ①中… II. ①颜… III. ①佛教史-研究-中国-中古 IV. ①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8582号

中国中古佛教史论

(宝庆讲寺丛书·中国佛教学者文集/朗宇法师、清修法师主编)

颜尚文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0(编辑部)

策划组稿: 黄夏年

责任编辑: 卫 菲

版式设计: 陶 静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5印张 330千字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345-4

定 价: 42.00元

总 序

从佛法本身来说，教、理、行、证的修学次第，已经为佛弟子指明了修学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为自己的资质、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于是形成不同类型的佛法，有重义理、重实践等区别。但是，作为佛弟子来说，义理的探讨是为了将佛陀所要开示的真实事理，充分、完整地表达出来，如“阿毗达摩”虽然着重于论证“法”的自性、定义、关系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于“谛理的现观”，最终归于修证。那么，重修证的佛教，主要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重视佛法的适应性、实效性，所以对事相的分别比较少，如初期大乘经典以“般若”、“三昧”、“解脱门”、“陀罗尼”、“菩提心”等作为中心，来表达从发趣、修行到证入的历程。虽然存在着种种不同的侧重，但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义理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中心。中国佛教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如天台智者大师的教观并重，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高僧传》将古代僧人分为十科，其中翻译、解义、读诵便属于义解

门；而习禅、明律、感通、遗身、护法、兴福，都是属于实践门；最后一科“杂科”则是指出家人的外学修养，旁及世间经书、治世语言、礼乐文章等，无不兼通。

但是，传统意义的佛教义解，主要是注疏经、律、论，在“述而不作”中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观点，当然也有一些专门性的著作。而且，这些佛教义解僧，都是从自己的信仰与经验出发，通过注疏、论著，来达到实践与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兴盛、隋唐佛教的辉煌，都与义解的繁荣是分不开的。而禅宗的发展则为中国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视主体的体认、自己身心的解脱；净土法门的流行，激发了信仰佛教的感情，为佛教走入社会提供了方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禅、净的流行，在这种“简单”、“不立文字”的潮流下，中国佛教徒逐渐失去探讨高深佛理、考察繁琐戒律的兴趣。于是，中国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的优良传统便丧失殆尽。

另一方面，佛学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却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应该是开始于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殖民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必须要深入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于是，通过接触梵文、巴利文等东方语言，开始了解佛教的理论，消化佛教的教义。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些学者注重现代佛学研究的

客观性、纯学术性,形成了佛学研究的现代传统,于是佛教便成为一种学问——佛学。19世纪后期,日本佛教界开始运用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从而推动了日本佛学研究的兴盛与发达。随着“西学东渐”、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增强,中国开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这在当时中国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与回应,如《大乘起信论》、《楞严经》的辨伪,“大乘佛教非佛说”的讨论,“佛教非宗教非哲学”之辩等。同时,佛教界受时代流行的学术方法的影响,尤其是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人生佛教”运动,佛教理性主义思想的高扬都直接推动了佛教界从事佛学研究,其中以印顺法师的成就最大。但是,相对来说,学术界则在佛学研究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像吕澂、陈垣、汤用彤等,皆为一代学术大师。

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复寺院、重塑佛像的工作,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香火旺盛的现象。于是,培养人才、弘法、学术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各方面人才的紧缺无形中遏制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而人才的成长与培养,这又与佛教界的观念与重视程度是成正比的。

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

气的影响,文献学、考据学、思想史、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析,定性定量,促使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等领域,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更凸显了佛教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显示其优胜之处。通过学术研究,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提高了人们对佛法的正确认识。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同时,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圆融转化佛教的思想,向社会表达佛教的看法,这些都是有益于社会与众生的活动。

因此,佛教学术研究的根本意义,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佛教发展形态,而且更是从现存的文献、文物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探索其前后延续,彼此关联的因果性;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本质,及其因时、因地的适应。以了解过去,承受根本的佛法特质,作为我们信行的基础,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代表大会便提出要契理契机地弘扬“人间佛教”思想,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以文化阐扬佛法,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契理契机地以文化阐扬佛法是实现佛教中国化、本土化、现代化的权巧方便。”现代中国佛教界,应该认真地认识学者们的新观点,吸收其中的有用之处,通过转化与变通,仍然能够落实到佛法的信仰与实践,佛教才具有更大的潜力。

宁波宝庆寺始建于北宋端拱二年(989),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嘉定十五年(1222)宋宁宗赐名“宝庆讲寺”。寺里历代住持及僧众均有重视义理、尊重学术、礼待学人的优良传统,一直讲法不辍。曾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性启蒙教材《三字经》的作者王应麟曾为宝庆寺撰写了《宝庆讲寺记》。大儒黄震为寺里撰写了《宝庆寺观音殿记》。此二文的碑刻至今仍然保存完好,高高地耸立在寺里。现在宝庆全寺僧众十分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在日常事务、早晚功课、坐禅念佛等之外,勤于读书,研究经论。我本人自从出家以来,参访名山大寺,受到多位高僧大德善知识的指点,喜欢研读经论及现代学者的研究著作。因此无论到哪里,我都会带上一些书,也经常会到各地的书店去逛逛,看到佛教书籍经过十多年的出版,蔚为大观,感到欣慰。但是,对于社会的需求和佛教文化的发展,目前出版的书籍远远无法满足人们对佛法的需求,而且现有书籍之中,难免良莠不齐,精品佛教图书仍然少见。

有感于此,我和道坚法师、圣凯法师、黄夏年先生进行一些交流,得到他们的赞同与支持。于是,我们决定以本寺的名义出版一套丛书,希望能够推进佛学研究的发展,让佛法能够深入社会人心,达到净化人生的效果。

朗 宇

2004年6月21日于宁波宝庆讲寺

字

宇

目 录

总 序	朗 宇(1)
汤用形的汉唐佛教史研究	(1)
后汉三国西晋时代佛教寺院之分布	(56)
梁武帝的君权思想与菩萨性格初探:以“断酒 肉文”形成的背景为例	(119)
梁武帝“皇帝菩萨”的理念及政策之形成基础	(171)
梁武帝受菩萨戒及舍身同泰寺与“皇帝菩萨” 地位的建立	(250)
梁武帝批注《大品般若经》与“佛教国家”的建立	(320)
后秦姚兴的政治与佛教	(358)

隋〈龙藏寺碑〉考(一)——定州地区与国家佛教	
政策关系之背景	(384)
法华思想与佛教小区共同体	(416)
沈约的宋书与史学	(437)
《宝庆讲寺丛书》已出书目	(480)

汤用彤的汉唐佛教史研究

一、前言

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于1938年出版后，与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同获得抗战时期教育部学术研究一等奖。该书不仅在当时就得到学术界的推崇，且经过60年的考验，国人仍无法在中国佛教史领域内，超越汤氏的成就^①。此书也普遍受到世界上治佛教史学者的赞扬，可

① 民国时期教育部1940年3月设学术审议委员会，奖励学术研究和著作发明。到抗战结束止，颁发一等奖14人，而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得哲学类一等奖，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得社会科学类一等奖。教育部又设置部聘教授，1942年的第一批部聘教授为吴宓、陈寅恪、汤用彤、萧一山等28人。1943年又聘柳诒征、冯友兰、萧公权等15人。由此，可证明汤氏此书在国内学术地位被肯定的情形。见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4年，第687页。又蓝吉富“汤用彤及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文，评析民国以来中国佛教史的各家著作之后，认为“60年来之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内，欲觅一能与汤先生比肩之我国学者，恐尚难得其人。”见氏编“现代佛学大系”第27本、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台北，弥勒出版社，1982年）卷首，第1页。

说是一部划时代的经典之作^①。因此,了解汤氏及其著作,将有助于中国佛教史研究方向的抉择与进一步的探讨。

汤用彤,字锡予,原籍湖北黄梅,清光绪十九年(1893)6月21日(阳历)生于甘肃渭源县,启蒙于父亲所任教的学馆,1912年进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1922年获哈佛哲学硕士回国。返国后,先在东南大学,后于天津南开大学任哲学系教授、系主任。1931年,北大以美国庚子赔款补助特聘教授之名义将其延入。1937年抗战爆发,随北大先至长沙,后至昆明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抗战胜利后,随北大复员回到北平,任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1947年休假赴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讲中国佛教史一年。1948年荣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49年后一直留在北大,1964年五月一日逝世,享年72岁^②。

汤用彤学术的主要成就建立在回国至1949年前这一段时间里,也就是1922年至1949年。1949年后因环境以及身体的关系,较难与此前相比。汤氏在30至57岁这一段人生的高峰期里,在各大学教授的主要课程有: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印度哲学史、西洋哲学以及哲学概论等。在研究方面,这近30年间,主要以中国佛教史的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部分为

① 荷兰来顿大学教授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一书序言称赞道:“像所有研究中国佛教的学者一样,我深深地感谢汤用彤教授。他的作品已成为价值至高的工具与导引。”见 E. Zürcher: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Leiden, 1959, p. 2。又蓝吉富,前引文谓“日本望月佛教大辞典为世界上最权威的佛学辞典,该书中引用的现代中国学者著作并不多,而汤先生此书即为其中之一。这本书之受国际学者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② 有关汤用彤的生平、著作等资料,本文于后面章节再予举证。

中心,编写课堂讲义,考订大量的史料,阅读相关书籍并作成数十册札记,发表数十种专题论文,出版《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以下本书简称为《佛教史》)等专书。本文以“汤用彤的汉唐佛教史研究”为题,除了较容易把握汤氏主要贡献与精神外,且能于中国佛教史的领域获得较为关键性的理解。此外,作为汤氏汉唐佛教史准备工作的印度哲学史部分,亦在本文论述之内,而其他的魏晋玄学、道教史、西洋哲学等部分,囿于本题之限制,拟他日再为文探讨。

西方势力的人侵使近代中国面临两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内忧外患的深重,促使政治、社会、经济,乃至整个文化思想急遽迁移。特别是中国传统在面临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战时,究竟应该怎样转化的问题,普遍受到近代知识分子的热切关怀。汤用彤面对这中西文化问题,他迥出众流,超越时人着眼于当代的探讨,而与陈寅恪同样取径于我国中古时期与其他民族交往的历史研究,要为中西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这一大问题,提供更广博精深、坚强有力的历史线索。^①然而促成汤氏毕生致力于中国佛教史的学术工作兴趣,究竟渊源于哪些因素?汤氏是我国较早的有系统地应用文化人类学理论研究中外文化接触变迁问题的学者,且从其中提出中国文化发展的建设性看法,那么他的这些论点所依之动力又是什么?本文主题在理解汤氏的汉唐佛教史研究,因此首先必须探讨他的汉唐佛教史之准备工作。其次,应该透过对他的汉唐佛教史之体系、理论与方法的全盘掌握,评估其主要成就,才能

^① 参见余英时:《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刊在台湾《“中国时报”》,1983年3月19日人间版。

对我们这一方面的努力有所帮助。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分成六个章节,加以探讨。

汤用彤是地道的学院型人物,从不参与其他活动也不写通论性文字,可说完全没有俗世的名声,治的又是较冷门的佛教史,故至今研究汤氏的专门性文章尚难得一见。有关汤氏的生平数据、论著文字之搜集也相当困难。例如两年前日本出版的《中国佛教史辞典》“汤用彤”条,连生卒年代都不详。^① 由于本文囿于材料之缺乏,不得不以推论来弥补而留待他日补正,疏漏在所难免,企盼各方先进不吝赐教。

二、汤氏的教育与佛教史兴趣之渊源

(一) 传统教育

汤用彤之父汤霖,字雨三,光绪年间中进士,曾任甘肃渭源知县。汤霖为宦不久丢官,此后在兰州和北京教馆。汤氏早年就学父亲所教之馆,直至辛亥革命前始入北京顺天学校。1912年(时年20岁)考入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汤氏弱冠以前从父亲所受的传统教育,对他研究佛教史的兴趣有很大的影响。^②

① 鎌田茂雄主编:《中国佛教史辞典》,日本,东京堂,昭和五十六年,第287-288页。此外,笔者所见探讨汤氏的专门性文章甚少,蓝吉富前引文,可说是学术性的一篇,然仅3页的篇幅。贺麟《当代中国哲学》,于汤氏部分不足两页,但甚精辟。其他散见于《中国近世佛教史》或哲学史等书,则参考性甚少。有关汤氏的资料,笔者历年来已尽力收集,仍苦于不敷应用。

② 汤一介:《汤用彤传略》,1980年六月二十一日汤用彤98岁冥诞作,收在《中国社会学家传略》,第57页。

汤氏“幼承庭训，早览乙部，对历史有浓厚兴趣”，他的父亲治“汉易”，而易、老、庄三玄，是魏晋时佛教得以入华的主要桥梁。汤霖除了喜欢这种玄远之学以外，当亦治佛学，贺麟特别提到汤用彤“继承他家传的佛学”^①。而且汤用彤也在他的《佛教史》跋，说明他治佛学的渊源：

先父雨三公教人，虽谆谆于立身己行之大端，而启发愚蒙则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彤稍长，寄心于玄远之学，居恒爱读内典（佛学）。顾亦颇喜疏寻往古思想之脉络、宗教（佛教）之变迁。^②

父亲的启蒙教育以“虽谆谆于立身己行之大端，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为主，使汤氏此后得以养成优秀的品德，并以发扬古圣先贤伟大之人格思想为己任，他自谓作《佛教史》之目的在：

俾古圣先贤伟大之人格思想，终得光辉于世，则拙作不为无小补矣。^③

《梁高僧传》是较早的一部高僧传记，钱穆说汤氏虽战乱流离时亦不离本书，且专意收藏各种版本，几无遗漏。^④他不但早在1930年就发表《读慧皎高僧传札记》^⑤，且至临终还在

①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嘉义，西部出版社影印，1971年，第24页。

② “现代佛学大系”第27本《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第1页。

③ 同上，第2页。

④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三民书局，1983年，第164页。

⑤ 汤用彤：《读慧皎高僧传札记》，刊在《史学杂志》第2卷第3、4期，1930年9月。

做《梁高僧传校注》^①。虽然《高僧传》可视为一种佛教史料，但从汤氏著作中，不难看出对古圣贤的仰慕之情。笔者认为汤氏如果没有这种追求先人完美人格的热情，是无法终生尽瘁于佛教史研究的，观其《佛教史》一书，以人物思想的演变为中心，就可了解。且贺麟说道：

试看他提到辅嗣、子玄、子期、肇公（僧肇）、道公（道安）、生公（道生）等人之亲切热稔，就可知他尚友千古之同情态度，已溢于言表了。^②

我国伟大的思想家中，汉末以后至隋唐间，佛教人物扮演重要角色，辉映出无数人格生命的光彩，此点或许对汤氏选择治汉唐佛教史有影响吧！汤氏描述自己于少年时期，就“寄心于玄远之学，居恒爱读内典”。可以充分证明他治佛学的兴趣来自于家庭以及自己个性的影响。而〈早览乙部〉与“颇喜疏寻往古思想之脉络，宗教（佛教）之变迁”则于日后佛教史研究，不但奠定良好的基础，且有先决性的影响。此外，汤氏个性温厚、沉静、勤勉、有学者精神，^③更使他能笃志向学，毕生理首于学术工作。

① 任继愈：〈悼念汤用彤先生〉，刊在《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

②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嘉义，西部出版社影印，1971年，第25页。

③ 钱穆谓“汤锡予、熊十力、蒙文通及余四人，时时相聚。时十力方为新唯识论，驳其师欧阳竟无之说。文通不谓然，每见必加驳难。论佛学，锡予正在（北大）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然不语。惟余时为十力、文通缓冲。”汤氏于本行能沉默不与论争，也可推见其个性温厚、沉静之一斑。此种个性之描写，在钱穆前引文的记述里，如“喜孤寂”，“性至孝”等记载甚多，本文不予赘述。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三民书局，1983年，第155页、第176-177页、第243页。